曲尽千年兴衰

——司马光与《资治通鉴》

赵冬梅

一起读经典

《资治通鉴》(繁体竖排版):司马光编著;中华书局出版。

如果要选择一部书来了解宋朝建立之前1000多年的中国历史,那就是《资治通鉴》。从春秋战国的分界"三家分晋"起笔,到秦始皇建立帝制,汉帝国巩固一统,王朝国家纷纷扰扰,天下大势分久必合,直至五代十国乱世消歇,秩序重建,国之盛衰,人之得失,制度流变,风俗转移,尽在此书。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(1084年)十二月,全书正文294卷、目录30卷、"考异"30卷,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年),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(959年),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,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宋朝以前历史的重要书籍。它的作者司马光与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并称为"史家两司马"。《史记》与《资治通鉴》,两部大通史,一纪传、一编年,一西汉、一北宋,相隔千年,双峰并立,是华夏史学文明的重要标志。

司马光编著《资治通鉴》(以下简称《通鉴》),是因为前代史书浩繁,学者穷年累月不能通读,即便读了也抓不住历史发展的脉络,而人的本性趋向简易、厌恶繁难。司马光担心长此以往,人们将弃史不读,有关过去的记忆行将泯灭断绝,因此,他要用一种比纪传体更简单的方式来写作一部更为平易近人的史书,用一部书来容纳1000多年的历史,网罗众说,成一家之言。

司马光有三位得力助手——刘攽、刘恕和范祖禹,他们在他的指导下"遍阅旧史,旁采小说",对存世史料一网打尽、全数吸收;然后以"宁失于繁,毋失于略"的原则,尽可能采用旧史原文,编纂"长编",以为草稿。在"长编"的编纂过程中,助手要对旧史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甄别,另文说明"所以取此舍彼之意",写作"考异",以展现不同记载的差异,说明判别之理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既有实地考察,也有史料对照取舍,但是《史记》的文本隐藏了论证过程,只呈现顺滑的叙事;而司马光《通鉴》所创立的"考异"之法,则将材料的考辨过程完整地呈现给读者,它是"更讲道理的",这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一大进步——以"研究"为基础的叙事。"考异"中所展现的差异性记载,也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。

最后,"长编"抵达司马光,他的工作是删去其中无关宏旨的内容,让《通鉴》以顺畅的文字呈现出历史的清晰脉络。由助手编纂、书手抄写的草稿——"长编"每四丈一卷,摊开在司马光眼前。司马光一边读一边把可以修入正文的部分另纸标记下来:每一事只记起首和结尾字样。这一环节的草稿,可称作"标记稿"。国家典籍博物馆保存的那一卷《资治通鉴稿》应当就是司马光的"标记稿"。司马光的"标记稿"和相应的"长编"一起,交还给书手,由书手抄成定稿,刊刻成书。从47岁开始,到66岁结束,特别是在53岁退归洛阳之后10多年的"全职历史学家"生涯中,司马光几乎每天都要这样工作。他给自己规定的工作量是每三天删一卷,如果有应酬耽搁了,就一定要加班加点把进度赶回来。没人"卷"他,是他早已把编著《通鉴》认作了自己的"天命"。

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呢?以唐代部分为例,一共289年,前161年的"长编"确知是200多卷,800多丈长;后面的128年,年代更近,史料更丰富,信息更致密,草稿长度绝对在600卷以上,唐代全部"长编"加起来就是3200丈。3200丈漫漫长卷,要一个字一个字看下来,司马光却在这漫长的工作中保持了始终如一的认真严肃。黄庭坚参与《通鉴》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,翻阅过其中的几百卷,他看到,司马光所作批注,"讫无一字作草"。

《通鉴》的叙事,说什么,不说什么,怎么说,都经过了司马光的鉴择取舍。而《通鉴》直接表达观点的议论部分"臣光曰",更出自司马光的手笔。全书所展现的,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,以及司马光的历史思考。

《通鉴》的目标读者,是以皇帝为首脑的当政者。唐代中期以后,皇帝越发走向国家政治的前台,"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必要",为皇帝编著适合阅读的书籍成为当时的需要。在《通鉴》以前,宋朝国家组织编纂了四部"御览"大书:《太平广记》500卷,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册府元龟》各1000卷。就编纂目的而言,《通鉴》是这四部"御览"大书的延续;就编纂原则而言,四部大书是对之前相关知识分门别类的简单汇集,而《通鉴》则是一部史书,更便于在时间序列中展现因果,呈现治乱兴衰的过程,"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历史认识方式"。

在司马光的心中,史书是沟通古今的桥梁,"史者,今之所以知古,后之所以知先"。严肃而认真的读史者,有望超越个体和时代的局限,掌握"迄今为止"的人类智识。因此,他主张皇帝"不可以不观史",皇帝观史,不能挑挑拣拣,正面的经验、负面的教训都要认真对待,"善者可以为法,不善者可以为戒"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这样赞美《通鉴》:其曰"通"者,何也?君道在焉,国是在焉,民情在焉,边防在焉,臣谊在焉,臣节在焉,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,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。虽扼穷独处,而可以自淑,可以诲人,可以知道而乐,故曰"通"也。

《通鉴》还在写作初期,就已经随着它的作者进入了皇帝的读书班——"经筵"。司马光给宋神宗讲汉初"萧规曹随"故事,结论是如果汉代一直守着高祖的法度不改变,就一定会长治久安。结论做得过于笼统,遭到吕惠卿的攻讦和嘲讽,司马光赢了辩论,却给后世读史不细的人留下了保守顽固的坏印象。其实,司马光主张保守不变的,一直是儒家仁政爱民、追求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利益平衡的治理原则;至于具体的政策措施,他同样主张兴利除弊。司马光是保守主义的改革派。一个能曲尽千年兴衰的史家,怎么可能不知道变化才是世间的永恒?!

(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

读书有味

AI时代,回到"具身阅读"

胡洪侠

每次读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七回《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》中贾宝玉和晴雯告别的那段文字,我都忍不住流泪。今年读到这里,泪眼模糊之余,我想到了一个与大观园故事无关的问题:如果读AI(人工智能)替我生成的内容提要,我会一如既往地感动吗?

AI时代来临,传统阅读方式遇到的是全新的挑战。前些年我们常常讨论新兴阅读方式如何与纸质书阅读并存互补,现在我们要担忧的是"阅读外包""思考外包""体验外包"的问题。也就是说,原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方式读书,现在变成了还要不要亲身、直接、完整地读纸质书。

我喜欢AI,几年来一直尝试学习如何与AI协同来改善自己的阅读与写作。无论是检索比对、推荐书单,还是提供学术见解,有些时候,AI简直就是我阅读的良伴甚至导师。

但是,我也不止一次掉进AI生成的"陷阱"。它给我提供了太多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书目、"原文"和档案文献编号。更麻烦的是,它的阅读服务可以孜孜不倦,提供的方案可以源源不断,我渐渐感觉到一种"危险":我会不会越来越满足于摘要与二手解读?是不是不再愿意像原来那样不厌其烦地亲身直面完整的原始文本?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忍住把细读、求证、涵泳过程都交付算法的冲动?AI会不会从人与文字的桥梁,变成人与书籍之间的墙?长此以往,我会不会在书房里守着万卷藏书却与书越来越远?

我知道,我面临的是AI时代读书人普遍面临的风险。渐渐脱离完整的、沉浸式的、亲身介入一本实体书的阅读过程,仅仅从效能出发,依赖AI等工具,把"读书人"身份异化成了"用书人",把"好书"的标准简化成了"好用的书"。原来人和书的那种亲密关系正在变得疏离:离纸质书越来越远,离真正的阅读越来越远。

一个问题由此越来越急迫,那就是"具身阅读"。

所谓具身,就是让心灵、意识、认知、审美,以身体为载体真实呈现出来。我理解的具身阅读,就是挑出自己最想读、该读、喜欢读的经典,用身体感知纸页,用眼睛逐字阅读,用大脑独立思考;就是强调专注而又沉浸的深度阅读,强调阅读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;不是机器读给我听,不是AI帮我总结,不是算法替我思考,而是亲自读、亲自想、亲自感受,全流程哪个环节都不外包。既然是读自己喜欢的书,那就要最终读成"自己的书",不仅这书属于你,这书的阅读过程也属于你,阅读时新生的体验、激活的记忆都属于你。

具身阅读不是我的杜撰,而是有认知科学领域的前沿成果支撑。有研究认为,人类阅读不是单纯解码文字符号,理解与共情离不开身体记忆。当我们读到"寒风扑面""登高望远",大脑会自动激活负责触觉、视觉、运动感知的神经区域,调取过往身体的经验来完成"心智模拟",由此诞生共情、体察与价值判断。

当今"最美的书"评选中有一个共识:一本好书,不仅内容要好,还要经由书籍设计,能让读者诉诸全部感官:视觉上的字体与色彩,触觉上的纸张与纹理,听觉上的翻页之声,嗅觉上的纸墨气息,体感上的舒适持握与阅读体验。这可以算是具身阅读的美学依据。

当然,我说具身阅读时,主要指的是我自己喜欢的人文阅读。人文阅读最讲究共情与体察人性,这都需要建立在具身模拟之上。我给自己设计的阅读是这样的:拿一本自己热爱的经典,选无人打扰的时间和空间,不用模型,不伴随社交,不找AI代读,不让手机打断。是"原读",是"离线阅读",是"非算法阅读""无模型阅读"与"人脑独占阅读"。我希望自己借此重获完整的阅读,训练大脑重新变"深",直面复杂问题,搞清底层的逻辑与隐藏的结构,而不是终日沉浮在碎片的资讯、现成的答案和纷飞的情绪里。这个磕磕绊绊、寻寻觅觅、哭哭笑笑的过程,或许就离具身阅读不远了。

跨越古今的星空对话

齐 锐

《中国星空:星河里的中华文化》:齐锐著;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。

在天文科普工作中,我常被问及:"星星本无分别,为何会有中国星官与西方星座之分?"这个问题,道出了星空文化的核心——星空不仅是天体的集合,更是不同文明对宇宙的理解、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构建。

说到星空文化,西方星座体系早已为大众所熟知。其起源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,此后古希腊人将神话传说融入其中,最终形成48个古典星座。1928年,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全天确定为88个星座并沿用至今。而中国古人眼中的星空,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天地——这里没有神话中诸神的争斗,却有一套与人间秩序、文化基因深度绑定的"星空体系"。

古人将地上的社会结构、生活场景、官职制度完整"搬"到天上:紫微垣是天帝的宫殿,对应人间紫禁城;太微垣是理政的朝堂,排列着"三公""九卿"等星官,象征治国秩序;天市垣是天上的市集,有"列肆""屠肆",映射出古代社会百态。每一颗星、每一个星官都能在人间找到原型,星空成了古人理解社会、映照生活的"镜子"。

更精妙的是中国星空严谨有序的"系统性"。以"三垣二十八宿"为框架,整个天空被划分得条理分明。"三垣"居于北天,是星空的核心区域,主次清晰;"二十八宿"沿黄道、赤道分布,如一条"星带"绕天一周,又按方位分为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象,分别对应四季更迭。古人通过观测四象的出没与方位,便能精准确定农时、制定历法,这种将星象与自然节律、生产生活深度绑定的体系化智慧,是西方星座体系中少见的。

中国星空不仅是独特的天文知识体系,更是华夏文明的根脉。从《诗经》"三星在天"的婚嫁场景,到杜甫"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"的离别感慨;从取象紫微垣、"象天法地"的北京故宫布局,到《黄帝内经》"天人相应"的养生理念;就连群经之首《周易》也与中国星空形成共振,"十二消息卦"对应一年十二个月份,将星辰运行、物候流转、节令更迭与人事活动融为一体。

本书以"三垣二十八宿"为骨架,展开对古代传统星象文化的解读。从四象的起源讲起,梳理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如何标识时空变迁。解析二十八宿如何成为划分天区、制定历法的基石。展现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垣所体现的"象天设都"的古老理念。我们还探寻星象背后的文化内涵,穿插中西星座对照,帮助读者理解传统星空体系。

阅读本书的最佳方式,是文字与实践相结合。一边品读星官背后的文化故事,一边走出户外仰望夜空,在实际观测中验证书中的知识。当你在四季星空中辨识出对应的传统星象,便会深刻体会古人"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"的智慧,感受到传统文化与自然宇宙的奇妙联结。

(作者为北京天文馆副馆长、北京古观象台台长。此文为《中国星空:星河里的中华文化》一书序言,本版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。)

序与跋

推开窗,放轻松

——《等鸟来:扫把的观鸟手账》读后

刘 阳

翻开《等鸟来:扫把的观鸟手账》(重庆出版社出版),你大概会忍不住笑出来:原来鸟可以这么有趣。我是真的被书中表情丰富的小鸟给逗乐了,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,读来轻轻松松,鸟类知识和生态常识,毫不费力地装进脑子。这大概就是本书的意图:观鸟这件事,本来就是轻松的、好玩的、人人都能参与的活动。

从家里阳台上来蹭早饭的麻雀,到小区绿化带里嗓门奇大的噪鹃,再到公园水边踱步觅食的"夜师傅"(夜鹭),观鸟从城市就能开始。就在你每天经过的那条路上,抬头看看天空,多瞄一眼花坛,鸟就在那儿。书里关于鸟类外形特征和行为的描述,关于它们怎么吃饭、求偶、互相"吵架"的趣味记录,就是很好的入门向导。

当然,光有热情还不够。望远镜怎么选?去哪儿找鸟?什么时间段鸟最活跃?这些问题,书里都有答案。更重要的是,作者还告诉我们,观鸟是有"规矩"的:不追、不惊、远远看、不打扰,保护鸟类栖息地、防止鸟撞玻璃、救助受伤的鸟……这是走近自然的人应有的行为准则。你甚至可以成为鸟类调查志愿者,参与水鸟调查、记录猛禽迁徙、统计繁殖季的筑巢情况……每一个普通的观鸟人,都可能成为守护鸟类、保护自然的"科学家",这件事,有意义,也有趣。

这本书信息量很大,但读起来一点不觉得累。每一只鸟的特征,被作者用最直观的方式"甩"在你的面前——眉纹的颜色、翅膀上的斑点、尾羽的形状,一眼就懂。再配上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小表情、小动作,看过一遍就很难忘掉。这也是作者的独特技能:把专业鸟类知识,画成你一眼就能看懂、看完还想再看的图。之前的《荒野笔记》《在重庆等鸟来》就是这个味儿,而本次的新书更好玩,内容也更"能打"。

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。最近的科学研究发现,观鸟和聆听鸟鸣,能让大脑状态变好,焦虑减少,注意力集中,整个人都松弛下来。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,观鸟是一件让你放松又有收获的事。不需要专业背景,不需要昂贵装备,不需要专门腾出时间,推开窗,走出门,等鸟来,就这么简单。

(作者为中山大学生态学院教授、副院长)

上图为书中插画。 重庆出版社供图

新书架

《我在社区当书记》:谢文龙著;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真实记录社区基层日常工作,展现了社区工作者用真心换信任、用实干解民忧的责任担当。

《太阳离弦》:杨遥著;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小说讲述了赵小平、李明等70后青年,在高考后各自求索、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。

书里书外

鸡毛换糖,换到了全世界

张乐天

在全球商贸往来中,一批出身农村、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义乌人创造了"买全球、卖全球"的佳话,启迪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化进程。《出海记:义乌商人的全球市场故事》一书选择9名代表性人物,通过个人口述分析"他们是谁""为什么能够成功",带读者窥见全球化新的发展。

2025年12月,非洲商人丁恩发布了一条短视频《我眼中的金枢纽》:15年前,他孤身一人来到义乌;现在,他有了团队,商品销往非洲16个国家。他说:"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的枢纽,这个枢纽不仅关乎商业,更关乎生活。"

与想象中"高大上"的全球化不同,义乌商人借助小商品深入世界各地,直接走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。当我们聆听义乌朋友讲述跌宕起伏的出海故事,总觉得过去的全球化理论有点儿隔靴搔痒,缺少些燃烧的、有温度的人间烟火。于是,我们打开了一个解读全球化的新视域,即"生活世界":出海本身就是在构建动态的、跨文化的、多元的、风格别样的生活世界。

从这样的视角出发,本书并不是一本经商宝典,而是一部文化交流启示录。主人公们的出海之路各不相同,但他们的成功有着相似的文化因素。

心相通。2025年1月,我到迪拜采访义乌经商者,晚上餐叙后,一名商人走到我身边,要扶我离开。我有点儿惊奇,说:"我的腿脚很好的,不要扶。"他说:"小心点,要关心老年人,奶奶说的……"此后,"奶奶说的"几度在我的耳边回响,加之听到更多故事,我似乎悟到了义乌人出海的密码:他们是好人,好人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。他们的成功,靠的不只是商业技巧,更是忠诚老实、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。而不管种族、民族、肤色有多么大的差异,不管来自哪里,大家都认同善、美、诚信、仗义等人类共通的价值观,它们构筑起真诚交流的"基底"。

理相同。概而言之,日常人际交往中的"入乡随俗"与经贸活动中的"按规矩做事",由于各地风俗十分复杂,要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。出海者要有共情能力,不仅要和他者"处于同一境界",更需对当地的文化"表一种共情",才能达成有效交往。我们在墨西哥城听到了义乌人与当地百姓之间的讨价还价,在迪拜看到了义乌人把当地文化植入商品使其备受青睐,也看到了义乌货主在商品通过海关时的穿梭运作……交往一旦开始,就超越了单向的"服从""遵从",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度对话。

利相共。我们从9个出海故事中,读出了传统智慧"鸡毛换糖"焕发的活力。其一,不求暴利,但求最优性价比。义乌换糖人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叫"进四出六",指的是挣100元时,要想着把60元给别人,这样才能保证一直有机会挣100元。这是商业活动中的分享精神,乐于分享利润,帮助合作伙伴,以促进自己商业成功。在迪拜和墨西哥城,义乌商人总是小心翼翼地给每一个商品定价,做到最优性价比。这种源于"鸡毛换糖"的"利相共",使他们赢得了全世界顾客青睐,实现薄利多销。其二,不求独占,但求广泛的商业网络。曾经,义乌人挑着货郎担走天下,广交朋友,建立关系网,叫"开四门"。如今,"开四门"在出海中发扬光大。2013年前后,迪拜商人直接到义乌采购小商品,与中国人的批发生意形成竞争,但后者没有"围追堵截",而是逼迫自己向零售转型。这样的开拓,可以称之为"只求私利者定失利,心怀他人者终得利"。

当前,全球化进程遭遇回头浪,总结义乌商人"走出去"的经验启示,能够让我们增强信心。从生活世界的角度看全球化,随着人员与小商品的加速流动,不少原先与全球经贸联系较少的生活社区正在融入"地球村",一个美美与共的未来,值得我们为之努力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)

《出海记:义乌商人的全球市场故事》:张乐天、王琮涵著;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本社社址: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: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:100733 电话查号台: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: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:京工商广字第003号